

经济主体归位 与地区可持续发展

邱 东 著

经济主体归位 与地区可持续发展

邱 东 著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大 连

© 邱 东 200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主体归位与地区可持续发展 / 邱东著. — 大连 :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 2
ISBN 7-81084-577-2

I. 经… II. 邱… III. 地区经济 - 可持续发展 -
研究 IV. F0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1578 号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大连市黑石礁尖山街 217 号 邮政编码 116025)

总 编 室: (0411) 84710523

营 销 部: (0411) 84710711

网 址: <http://www.dufep.cn>

读者信箱: dufep@vip.sina.com

大连海事大学印刷厂印刷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发行

幅面尺寸: 148mm × 210mm

字数: 236 千字

印张: 9

印数: 1—1 000 册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方红星 柳 荷

责任校对: 刘铁兰

封面设计: 张智波

版式设计: 钟福建

定价: 20.00 元

作者简介

邱东，男，1957年8月生，祖籍江苏省张家港市。

1974年到辽宁省抚顺县大南乡插队，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辽宁财经学院（现东北财经大学），1981年获学士学位。1984年于辽宁财经学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0年于东北财经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现任东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校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主要社会职务：中国统计学会副会长、中国国情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市场信息调查业协会副会长、中国统计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会副会长、辽宁省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评审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统计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全国统计科学技术进步奖评选奖励委员会委员、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经济管理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统计科学研究中心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西安统计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天津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兼职教授、山西财经大学兼职教授、《统计研究》杂志编委等。

2 经济主体归位与地区可持续发展

主要著述：在《经济研究》、《统计研究》、《财经问题研究》等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论文 105 篇，出版了《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结构研究》、《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的系统分析》、《观念创新与政策实施之桥——现代可持续发展指标》、《谁是政府统计的最后东家》、《当代国民经济统计学主流》和《劳动力投入与经济增长》等专著，主持或参加了 28 部教材、工具书和译著的编写工作。曾 50 次获得国家统计局、财政部、教育部和辽宁省颁发的科研教学成果奖和综合奖励。

主要研究领域：国民经济核算、中国统计改革与发展、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可持续发展、宏观调节与区域发展等。

前 言

我于1957年出生在辽宁省抚顺市，尽管小时候有几年曾在浙江省杭州市生活，但总的来说，是东北的黑土地养育了我。1977年恢复高考后有幸从知青点考入大学，既从心底里感谢小平同志锐意改革为我们带来的命运转机，也真真切切地体会到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如果说毕业后任教的头十年主要是致力于国民经济统计的研修，那么担任大学的行政管理职务后，对改革开放过程中有关问题的深入思考就比较多。服务社会是大学现代职能的内在要求，从社会专业分工角度看，“建言”应该是我们大学教师更应该努力作为的，特别是担任了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后，我更感受到了这份责任。这本文集，便是我十多年来就中国改革与发展所作思索的结晶。

《经济主体归位与地区可持续发展》主要有三部分内容：（1）经济主体归位与宏观调节；（2）可持续发展；（3）地区发展。全书共有30篇文章。

“经济主体归位论”是我对中国改革开放过程的本质认识的概括，也是这本文集的核心思想。第一部分中有两篇文章专门论述这一观点，其余几篇则就政府这一特殊经济主体的作为展开论述，因为政府既有

严重的越位问题，同时也有严重的缺位问题，如果从归位长期过程的角度看，更有如何摆位和实践的问题。这一部分还附了两篇文章，是较早时期（1980年和1981年）撰写的，可以作为研究宏观调节问题的注释。

可持续发展是近年来一个热门话题，但深入的研究尚显不足，这里的探讨希望能做一点补充。这部分的文章，一是根据对可持续发展三大阶段的总结，对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测试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这两者是深入进行政策探讨和实践的基础，不能不加以重视。二是提出我们对如何认识和实践可持续发展有关问题的独有考虑，特别是《可持续发展层次论》，应该是很有原创性的。它和《经济主体归位论》、《政策位差资源论》这“三论”，构成了我在中国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方面的主要观点。

我对地区发展的思考是从大连、辽宁和东北出发的，这是从“三论”出发去思考实际问题的产物，也是积极参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关活动的产物。文章中有批评、评价，也有建议，无论以什么方式出发，都渗透着我对这片黑土地的深深爱意。也许在有些人眼里，我的观点失之偏颇，但它至少可以引发对某些问题的进一步深入思索，正因为“偏”才得以“见”，有新的信息至少不会浪费读者的劳动。我还要为自己辩护的是，尽管我的出发点是地方的，但却努力将问题放在更宏观的大背景下去思考。这些年来的大学教育，教给了我这一点，有鉴于此，文中的不少认识恐怕并不仅仅适用于本地区。

这里必须提及的是，在这十多年的研究中，命运为我安排了几位特别好的合作者，他们是：东北财经大学研究生部主任张向达博士、统计系副主任杨仲山

博士、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宋旭光博士、统计系教师陈梦根博士和徐强博士。由于他们的贡献，我对有关问题的思路得以充分地展开，并有了更为系统和翔实的论证。值此文集出版之际，谨向他们表示我衷心的感谢！当然，文中可能存在的偏误由我本人承担全部责任。

欢迎读者对本文集提出批评，但愿这本文集的出版能为中国经济主体归位过程的顺利实现做出一点贡献！

邱 东

2005年1月27日

于大连东北财经大学烛光园

目 录

第一部分 经济主体归位与宏观调节

政策位差”资源论	3
经济主体归位论	11
在全国人大十届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19
主体归位、秩序重构与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 ——一个非主流的宏观分析视角	23
中国地方财政收支状况的系统分析	52
附录一 有关国家范畴几个问题的笔记	88
附录二 谈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调节	107

第二部分 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观及我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125
对社会保障中几个问题的研究	135
可持续发展统计指标体系建设的回顾 与展望	141
可持续发展统计测度方法的系统分析	152
可持续发展层次论	162
多因素考察贫富问题对经济安全的影响	174
可持续发展的非线性理论 ——兼对“三个零增长”观点的反思	179

附录 简单再生产条件下副类比例关系中 几个问题的探讨——学习 《资本论》的一点体会	186
第三部分 地区发展	
论建设“北方香港”的利益驱动问题	201
用小平的开放思想指导“北方香港”的 建设	205
辽宁在第二次大开放中慢了一拍	208
强化管理应是辽宁国有企业走出困境的 首要措施	210
“三势两软”——对辽宁经济发展宏观管理 大思路的几点认识	212
对铁岭市“九五”规划及2010年远景 规划的总体评价及建议	225
从位次分析看金石滩度假区建设的 战略意义	233
“政策位差”资源与大连地区经济发展	235
科教兴市与市兴科教	241
辽宁省城镇体系“之”字形布局规划的 建议	245
从国家安全角度看加快辽宁发展的必要性	248
振兴东北——两个“所在”与十大理由	250
东北需要硬道理（三则）	254
加大振兴东北力度是实现地区协调发展战略 布局的关键	260
中国地区发展比较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264

第一部分

经济主体归位与宏观调节

“政策位差”资源论^①

一、由我国经济发展的两大特点所引发的思考

认真回顾十五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会发现两大特点：

一是这种发展是外延扩张型的。这可以从三个方面看出：（1）从地区看，深圳、珠海是这样，上海也是这样，上海这两年的发展主要在浦东，都是平地而起。（2）从企业类型看，发展的主要是乡镇企业、合资企业，也是新建的企业，从1985—1992年，全国各种经济类型工业企业数增加了近343万个，而1992年乡镇企业个数则是1984年的3.4倍。相对来说，原有国有企业发展不大。（3）从行业看，发展的主要是第三产业和家电、化纤、医药、建材等新兴行业，也不是原有重点产业。

二是这种发展是极点型的。从发展速度来看，第一个增长极点是以深圳、珠海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深圳1980—1990年GDP平均年增长率为47.5%，珠海1988—1992年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6.66%。第二个增长极点是以浦东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以极点为中心，整个发展呈现出从沿海到内地、从南到北的两大趋势。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发展格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 and 不同企业间实施不同的经济政策而形成的。没有中央的特殊支持，绝不会有深圳、珠海和浦东等地区的今天，没有地方政府为扩充自己经济实力而作的努力，乡镇企业也绝不会在某些地区达到“平分秋色”或“三分天下”的局面。由此可见，“政策位差”是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值得我们深入思考、认真研究。

政府对不同的地区、不同产业和不同类型企业采取不同的经济政策，形成了“政策位差”。根据实施对象的不同，“政策位差”可以分成三种：（1）“地区政策位差”；（2）“产业政策位差”；（3）“企

^① 本文由作者与东北财经大学教授杨仲山博士合作完成，曾发表于《财经问题研究》，1994（10）。

业类型政策位差”。比如，国家或地方为吸引外资而对合资或独资企业实施优惠政策等。

“政策位差”本身就可以是作用方向相反的，因而可以分成两类：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补贴，对贫困地区的财政扶植等，是按照均衡原则实施的，这种可以称之为均衡导向的“政策位差”；反之，对东部沿海地区，对国家所需的新兴产业在吸收外资企业条件、进出口管理、税收、外汇留成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则是按照效率原则实施的。这后一类效率导向的“政策位差”自改革开放以来作用十分明显。

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下面分析的重点在于效率导向的“地区政策位差”。

二、“政策位差”是一种经济资源

“政策位差”对一国的经济有着两种方向相反的效应：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而这两种效应既可以直接取得，也可以间接取得。

“政策位差”的直接极化效应主要表现在，由于优惠政策，使得某些地区：（1）个人的实际收入或预期收益高于其他地区，从而可以更方便地吸引所需人才和劳动力。（2）资金收益率较高，从而可以较容易地解决所需建设资金。（3）因减税使得生产成本转低，从而可以从外地以稍高的价格购买所需原材料和生产设备，优先得到所需物资。（4）在经济活动中比较灵活，所受限制比较少，工作效率比较高，容易在竞争中取得优势。

由于生产要素获取和经营中的方便，被优惠地区就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极点。经济增长极一旦形成，又会产生某种乘数效应，这是“政策位差”所带来的间接极化效应。增长极的经济发展就可能形成良性循环。

从静态和封闭的角度看，“政策位差”不过是生产要素在不同对象间人为的偏态分配，增长极的极化是以其他地区的牺牲为代价的。

但从动态和开放的角度看，如果（1）极化地区的要素产出率高于其他地区；（2）这种人为的偏态分配可以形成产出规模效益；（3）极化有利于从国外得到所需的生产要素，且当上述效益大于由其他地

区因生产要素减少带来的损失时，“政策位差”的使用就会造成整个国民经济产出的增加。正是这个增量，使“政策位差”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经济资源。

“政策位差”的直接扩散效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极的发展刺激了其他地区，使其切实感受到谋求发展的压力，比方说，没有乡镇企业和合资企业的发展，就难以真正体会到国有企业管理制度改造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二是极地的发展为其他地区提供了示范和经验，使其看到了自己发展的潜在可能，同时也看到了自己发展应该寻求或创造哪些条件，应该采用哪种模式，降低了创新的社会成本。

经济增长极的发展增大了对初级产品的需求，极地通过产品收购、对外投资和技术转让等方式来保证生产所需原材料的供应，给其他地区带来了更为广阔的市场。增长极的发展还给其他地区带来了大量要素收入。比如，近来有媒体报道，仅四川省的打工妹每年给四川创造的经济收入就有 50 个亿。随着增长极的产业高级化，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初级行业也会转移到其他地区。这些都是“政策位差”造成增长极后带来的间接扩散效应。显然，没有经济增长极，就没有这种扩散和传递。

从“政策位差”的这两方面效应看，效率导向型的“政策位差”优先扶植了增长极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带动了其他地区，这在总体上促进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因而，“政策位差”是一种经济资源，如果政策绝对平均地使用，就没有这种效应，就不会带来社会财富的更多增量。

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资源往往是指天然存在的东西，但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密不可分，资源的概念也应当拓广。比如，森林资源中人工营造林的比重越来越高，水资源要成为水力资源，也往往需要人为地加大水位的落差，所以很难将这些自然资源完全看作是天然而成的。当然，“政策位差”属于另一类经济资源，它与能够直接带来财富的实物资源还有一定的区别。

使用“政策位差”这种经济资源，一方面必须符合经济发展规

律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还必须适应一定时期内本国本地的实际情况。否则，也可能带来相当大的负效应。下面就这两个方面谈一些认识。

三、“政策位差”成为经济资源的一般性前提

“政策位差”要真正成为可利用的经济资源，必须具备一些前提条件，这主要包括：

1. 经济在各地区、各产业总是非均衡地发展，而不是平均地、全面地进行。一个发展过程通常包括三个阶段，即极点发展、点轴发展和网络发展。也就是说，新的增长总是从一个或几个点开始，进而连成线，最后成为一个面。在这个过程中，先是极化效应起主导作用，而后是扩散效应起主导作用。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非均衡发展尤为重要：集中有限的资金和资源，优先开发部分产业和地区，既可以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又可以局部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利于与国际经济的接轨。效率导向的“政策位差”，正是由于符合了经济发展的这种客观要求，才得以成为经济资源。

2. 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种要素的供给与需求往往是不平衡的：有的短缺，需要在地区或产业之间适当地分配；有的过剩，需要限制其使用。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总量短缺和结构性短缺是主要矛盾，而发达国家面对的则通常是过剩问题。

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当然取决于初始状态的情况，但更主要取决于这之后的动态配置过程。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仅靠市场或仅靠政府，都不能保证实现优化的要素配置，理性的选择只能是建立一种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要素配置机制。政府对经济要素配置的协调可以有种种方式，“政策位差”就是其中的一种。

3. 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经济决策有三大主体：个人、企业和政府。政府的作用在各国都是不可忽视的，区别只是其作用程度的不同。政府要在经济决策中发挥作用，“政策位差”就是一种重要方式。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政策位差”现象，其实正是西方首先提出三大决策主体的概念，比如，美国的土地休耕制度，就是

限制农业资源的使用，以保护农业发展和农民的利益。

4.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增长与平衡间以谁为先的矛盾。根据 U 理论，增长与均衡之间存在着 U 字形相关关系，即在经济发展初期，均衡度较高；随着经济发展，均衡度将有所下降；而在经济高度发展期，均衡度又会提高。可见，各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并不是线性地而只能是波浪式地缩小，经济均衡发展只是一个长期目标，不能把经济差距的任何扩大都看成是坏事。

必须看到，均衡与增长既对立又统一。从长期利益看，没有一定发展速度，国家和社会就不可能积累足够的资金，用来支持发展中地区的开发；而没有发展中地区的开发，发达地区也不可能顺利地实现产业和技术的梯度转移，从而保证其经济结构的先进性，发达地区所需要的市场、原料与燃料来源也难以保障。

四、走出对“政策位差”认识的误区

改革开放以来，“政策位差”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也招来了不少非议。对之做出科学的评价，将会对我国经济起飞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1. 要有一个基本的统计判断。“政策位差”在我国的实践效果如何，应该根据基本的统计来做判断。许多人认为它加大了发展中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经济的不平衡。事实是：

(1) 从 1978—1992 年 GDP 平均增长率来看，沿海为 15.48%，中部为 14.04%，西部为 14.26%。在年平均增长率超过 15% 的 10 个省区中，原不发达地区占了 5 个。考虑到我国分地区统计数据按地域原则计算，而近年来我国生产要素向沿海流动较多，所以沿海地区 GDP 中有一部分是中西部分的要素收入，实质上是内地经济实力的扩张。因而，三大地带的经济差距并没有计算和表象的那么大。

(2) 这些年我国经济属于普遍高速增长中的不平衡增长，即使增长最慢的地区年均增长率也超过了 10%。

(3) 东中西三大地带之间的经济增长差距小于各地带内部的差距，经济增长最快（广东）和最慢（上海）的省区都在沿海。